

南北戰爭 三百年

中國4-6世紀的
軍事與政權

李碩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目 錄

序言 (張國剛).....	1
前言	3

第一編 騎射、衝擊與軍陣：步、騎兵戰術的演變

第一章 早期騎兵戰術特徵：騎射與遊擊	23
第一節 匈奴騎兵戰術與其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的關係.....	23
第二節 《六韜》中的戰國騎兵戰術原則	27
第三節 秦漢之際的騎兵戰例.....	30
第二章 漢匈戰爭與騎兵衝擊戰術的肇端	36
第一節 漢軍與匈奴的戰術區別及社會背景.....	36
第二節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騎兵進攻戰略.....	41
第三節 衛青、霍去病的騎兵戰術革新：從騎射到衝擊.....	47
第四節 再論李廣與李陵.....	52
第三章 騎兵衝擊戰術的發展期（東漢到西晉）.....	57
第一節 劉秀時代的“突騎”作戰	58
第二節 漢末三國騎兵衝擊戰術的強化.....	65
第三節 漢末三國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	73
第四節 西晉的騎兵建設與運用.....	82

第四章	騎兵的馬鐙戰術革命與北方民族政權轉型	92
	第一節 關於馬鐙研究的學術史和考古證據	92
	第二節 騎兵衝擊戰術的成熟：馬鐙與馬槊	101
	第三節 衝擊騎兵的戰術運用特徵	113
	第四節 遊牧族對騎兵衝擊戰術的適應	121
第五章	4-6世紀南北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	134
	第一節 十六國北朝政權的騎兵建設	134
	第二節 北方騎兵對南作戰的特徵	139
	第三節 南方政權的騎兵建設	148
	第四節 南方騎兵作戰特徵	156
第六章	古代步兵軍陣的戰術特徵與發展歷程	165
	第一節 古代步兵軍陣的隊列特徵	166
	第二節 軍陣的“非理性異動”	178
	第三節 先秦至隋代的步兵軍陣變化趨勢	183
	第四節 南方步兵的特殊戰術形式	195
	附 錄 戚繼光對軍陣戰術的探討和對世俗觀念的糾正	203

第二編 南征與北伐：經典戰例

第七章	東吳的江防作戰與晉滅吳之戰	213
	第一節 漢末三國時期的隔江對峙與攻防戰	214
	第二節 伐吳的前期部署及司馬炎對將帥的戒備	221
	第三節 滅吳之役的部署	231
	第四節 伐吳之戰過程	237

第八章	陳朝的江防作戰與隋滅陳之戰	248
第一節	立國之初：與北齊的戰事	249
第二節	560年代陳內戰與北周、北齊的渡江作戰	254
第三節	隋軍滅陳之戰的部署	262
第四節	滅陳戰事實際進程	268
第九章	桓溫對前燕的北伐	275
第一節	南方對北作戰的地理因素	275
第二節	晉軍北伐中的黃—淮航道	280
第三節	桓溫伐前燕	284
第十章	劉裕對南燕和後秦的北伐	292
第一節	劉裕伐南燕	292
第二節	劉裕北伐後秦	300
結語	地理環境並非戰爭的決定因素	318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三編 成功轉型與積重難返：南北朝的戰爭與政權</p>

第十一章	北魏開國初期的戰爭模式	323
總論	拓跋北魏戰爭模式的三次轉型	323
第一節	拓跋珪伐燕之戰的戰爭形態	326
第二節	北魏前期的複合戰備形式（5世紀前期）	337
第三節	420年代拓跋嗣的對宋戰爭	344
第十二章	北魏政權中期的戰爭模式	350
第一節	拓跋燾時期魏軍的戰爭模式	350
第二節	北魏進佔淮北青齊與作戰模式轉型	373
第三節	北魏中期的步兵來源	378

第十三章 北魏政權後期的戰爭模式	389
第一節 孝文帝時期的魏齊戰爭形態	389
第二節 魏宣武帝初年的對南擴張	406
第三節 505-506年蕭宏北伐與魏梁戰事	413
第十四章 南朝的財政與戰爭	423
第一節 劉宋時期的戰爭與財政	424
第二節 南齊的財政與戰爭	435
第三節 梁、陳的財政與戰爭	441
總 結	451
第十五章 南朝軍人勢力與皇權	454
第一節 陳朝的“軍人共同體”特徵	456
第二節 宋、陳軍人改立皇帝的選擇	460
第三節 皇權對軍事將領的打擊與控制	465
第四節 皇權、將領對士族文化的追求	470
餘 論 文武分途與“南朝化”命題	477
參考文獻	480
後記	487

序 言

這是一本研究戰爭的學術專著。

聚焦的時代，是秦統一之後，分裂割據最嚴重的魏晉南北朝時代。作者不是敘述戰爭的故事，而是試圖探討在胡漢種族差異、南北地域差異這樣兩個特殊背景下，所進行的戰爭中的某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是從司馬遷到司馬光等史家都比較忽略的。

本書有三個視角。一是兵種（騎兵、步兵）及其裝備與相關戰術的演進，作者會從先秦兩漢的戰史追溯其起源；二是通過這一時期南北之間發生的若干經典戰例，分析戰略問題以及戰爭中各種複雜因素（地理環境、軍事技術、統帥素質等）的影響；三是討論戰爭本身與各行為主體（政權）的關係，包括戰備問題、財政問題、戰爭對政權運作的影響問題。

中國歷史古籍浩如煙海，軍事與戰爭的著作也十分豐富，《新唐書·兵志》更開啟了正史中記載軍事制度的傳統。但是，即使是對於戰爭記載特別關注的《資治通鑑》，對於古代戰爭中兵種的運用、戰術性細節的展開，也往往語焉不詳。李碩的這部書，試圖彌補其缺失，功不可沒，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李碩是一個有才情的青年學者。一直以來，我帶博士生，通常是與學生們商量選題，充分尊重研究生自己的意見，只有學生沒有主見的時候，我才會給一個比較樸實的題目，供其參考。李碩的這

部博士學位論文，是他自己讀書得間的產物。本書雖然受到博士論文體制的限制，但是仍然能看出作者傳神之筆。比如，作者認為西漢衛青、霍去病創立的騎兵衝擊戰術，用近距離搏殺對抗匈奴的遠距離騎射，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飛將軍”李廣的悲劇在於他個人的騎射之長，不足以彌補所統部伍的短處，在匈奴人面前，頂多只是顯示個人英雄主義色彩。馬鐙的發明、槊（長矛）取代戟，都適應了騎兵衝擊戰術的作戰要求。又比如，作者對於步兵方陣的分析，對於“陷陣”在兩軍對陣中的意義，要言不煩，能洞解史籍中許多不甚了然的記載。我相信，閱讀本書的讀者，重讀《資治通鑑》書中關於漢唐時代的戰爭記事，會有很多的助益。

當然，戰爭問題不只是軍事問題，戰爭其實是戰爭雙方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政權內部問題的外在表現。因此，談論戰爭與政權的關係問題時，就會涉及十分複雜的因素。作者在這一部分，試圖超越戰爭的技術層面，進行深入討論，雖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卻用自己的洞見啟動了讀者對於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思索。

博士畢業後，李碩本來可以留在內地高校，但是，他選擇到西北邊陲去工作。我能理解，因為我知道他是有情懷的人，有自己很高遠的理想，有自己的學術和文化追求。這些年我們雖然難得見面，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筆耕不輟。我猜想面對歷史的古戰場，李碩一定也會思考本書中他的那些推斷和討論，因此本書已經比較當年的博士論文有了新的靈感。

現在，這部博士論文就要付梓了，應李碩的要求，我寫上以上這些話，表達對該書出版的祝賀之意。

是為序。

張國剛

2016年12月10日於清華大學荷清苑

前 言

從戚繼光的難題談起

這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國 4 至 6 世紀南北戰爭研究》基礎上寫出的，研究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分為三編，分別講兵種與戰術、戰略與戰例、戰爭與政權。但本書的內容又不限於魏晉南北朝，而是會上溯得更遠一點，特別是關於步兵、騎兵的戰術變遷問題，要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考察，窺源方能知流，理清兵種戰術發展的整體歷程。

先說說為甚麼想寫這個戰爭史題材。我自幼接受的關於中國古代戰爭的敘事，都來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演義小說，以及由這些小說改編來的評書、影視作品。在這些敘事作品中，冷兵器戰爭的作戰模式非常程式化：兩軍對陣，先是各出一員大將，在陣前“大戰三百合”，待一方被“挑落馬下”，這邊全軍將士便乘機“掩殺過去”，大將被斬的那一方則是全軍倉皇潰逃，一場大戰便告結束。到近現代，又出現了“武俠小說”，冷兵器的打鬥就更神奇了，或者說更像巫術了。

真正的冷兵器戰爭，似乎不是這個樣子。但中國古代的戰爭究竟怎麼打？史書記載得往往不是那麼詳細。譬如楚漢之間著名的垓下之戰，雙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的陣列多長、多寬？是不

是和挖出來的秦陵兵馬俑一樣？交戰過程如何？在《史記》中都看不到。後世的著名戰役也都類似。當然，更早的情況會好點兒，《左傳》對春秋的戰爭記載就比較翔實。戰國之後的史書，就達不到《左傳》的水準了。

中國古代史書裡，對戰爭這些最基本的情況都大量“留白”，其實不全怪史官們無知，古代承平時期的將領們，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戰爭）應該怎麼打。亂世那些打過仗、有經驗的武將，又大都沒文化，沒法記載下來。

中國古人裡面，唯一一位探討過這個問題的，就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他不僅指揮打仗，還寫書記錄他的練兵、作戰經驗。他指出，當時明代朝野，包括軍隊裡面的將帥，關於戰爭的常見誤區是：第一，誇大個人“武藝”的作用，喜歡招募一些耍刀弄槍很花哨的武師，其實真正作戰的隊列很密集，根本沒有空間給他一個人跳來跳去、把刀槍掄圓了耍；第二，對“陣法”的理解很神秘，搞得像大型團體操表演一樣華而不實，平時操練好看，上戰場沒用。

關於戚繼光的這些意見，本書正文裡有專門的章節進行討論。一本研究魏晉南北朝，或者說隋唐以前戰爭的書，似乎不該出現戚繼光，但沒辦法，整個中國古代只有他一個人思考、指出過這些問題。而且，明代的冷兵器戰爭，基本原理其實和秦漢、魏晉、唐宋沒有區別。

中國古書對戰爭的記載先天不足，社會上的演義和武俠文學又太發達，自然使社會大眾對戰爭的理解嚴重失真，變成了上面介紹過的程式化、巫術化表演。當代學界也受影響，真有學者寫論文討論古代兵書裡的“青龍陣”“白虎陣”。本書對那些離常識有些距離的所謂“研究現狀”就不再列舉和分析了，因為那樣難免越扯越亂，就像理科學者無法跟“民科”對話。人文學科不是科學，就是

因為沒有一套剔除“荒謬學說”的客觀手段，只能靠常識，這顯然缺乏嚴格的操作性。

而另一方面，有些涉及古代戰爭基本戰術的問題，如步兵的隊列原則、作戰方式，目前確實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成果，本書嘗試着從古史文獻中尋找各種史料旁證，進行復原工作。這種寫法缺乏前人的“學術史”背景，像是在自說自話，也就不太像學術作品。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如果寫論文都要有“學術史”依據的話，人類知識恐怕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拓展了。

當然，中國古史對戰爭的記載，可供研究的信息還是有的，比如對戰爭地點的記載一般比較準確，可以和現代的地名進行對照，確定其大體方位，結合自然地貌進行研究。比如山勢，古今基本相同；河流和植被雖有所變化，結合《水經注》等文獻也能基本復原出當時的情況。

中國史書的情況是這樣。反觀歐洲，從古希臘人希羅多德記錄希波戰爭的《歷史》開始，到《遠征記》（色諾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亞歷山大遠征記》，一直有非常詳盡的戰史記載；再到古羅馬諸史，包括愷撒自己寫的《高盧戰記》《內戰記》，對於每一場大戰雙方的投入兵力、戰場地理環境、兩軍營地和陣列的變動、戰鬥每一環節的變化，甚至一些戰鬥中的偶發事件，都記載得非常詳盡。之後歷經中世紀以至近現代，歐美積累的戰史著作之多，任何其他文明都難以企及。所以，歐洲古代戰爭的很多戰術細節，可以和中國的史料進行互證，幫助我們復原中國古代的戰爭細節。不過在這方面，西方的漢學家能起的作用很有限。因為他們閱讀古漢語的能力往往不高，而中國古史中關於戰爭的細節記載，多需要在字裡行間“細摳”，西方學者還難以勝任。日本學者治學比較細緻，但多缺乏宏觀視野，目前還沒出現參照西

方戰爭史還原中國戰爭的力作。

本書內容簡介

本書標題“南北戰爭三百年”，指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但由於還要上溯秦漢，所以還包含了另一種形式的南北戰爭：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族之間的戰爭。在兵種、戰爭形態乃至民族關係方面，這兩種戰爭形態又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和密切的聯繫。

自東晉十六國至南北朝終結，中國經歷了近三百年南北分裂（317-589年）。如果算上之前的三國分裂割據，就是近四百年了。這是自秦統一以來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分裂時期。那麼，南北割據局面形成的原因是甚麼？分裂局面何以能夠持續三四百年時間？又是何種原因促成了隋朝的再度統一？本書劃分為三編，從不同的角度討論這些問題：

第一編，“騎射、衝擊與軍陣：步、騎兵戰術的演變”。

本編分為步兵、騎兵兩個部分，側重還原古代步、騎兵種作戰的特點和各種細節問題，以及兩個兵種戰鬥力互為消長的關係。關於守城與攻城技術，在秦漢之後、火藥兵器普及之前一直缺少變化，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已有詳盡研究，所以本書不做討論。簡言之，本書側重研究冷兵器時代的陸地野戰技術及兵種特徵，時間段限為從先秦至隋唐易代之際。

關於步兵戰術，本編主要討論以隊列為基礎的步兵軍陣作戰方式，這種戰術形式要求軍事組織具有自上而下的、嚴格的權力結構，所以以步兵為主的社會具有較明顯的集權化趨勢。有人可能

說：古希臘、羅馬都是步兵為主的，他們怎麼是民主社會？這話題很大，本書沒法涉及，但我們只要注意一點：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制度也沒維持太長時間，就自己演變成專制了，他們走向集權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也和軍事需求有關。

和步兵相比，騎兵戰術經歷的變化、發展更多，大的脈絡是：戰國時期陸戰以步兵為主，騎兵只能用弓箭充當輔助角色。最早的騎兵誕生於游牧族之中，其騎射、遊擊的戰術形態與游牧族的鬆散權力結構有密切聯繫；但在騎兵兵種被引進到中原（或者說農耕社會）之後，需要適應中原軍事體系的規範，探索新的戰術形式。在西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中，騎兵開始被大量獨立運用，並摸索出了用戟等短兵器進行衝擊近戰的經驗。兩漢之際到漢末三國，騎兵衝擊近戰的經驗逐漸積累，並逐漸導致了馬鐙的發明（兩晉之際），這些導致騎兵成為壓倒步兵的陸戰主力兵種。

騎兵是北方游牧族的主力兵種，所以北方民族也在學習中原的這種騎兵新戰術（衝擊肉搏的近戰），使匈奴、羯胡等得以驅逐西晉王朝、入主中原。騎兵技戰術的發展，正是形成這一歷史變局的重要原因。但只有在強有力的集權軍事體制下，統帥才能強制騎士們採用這種危險程度很高的衝擊戰術，所以北方民族要採用這種戰術，就必須脫離原有的部落聯盟的鬆散政體，建立集權政體。這是北方民族攻滅西晉、入主中原，建立起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的軍事、政治基礎。後世遼、金、元、清等北方民族興起和佔領中原（或者中原的一部分），其軍事背景就在這裡。

可見，本書在討論騎、步兵戰術的特點和發展時，重點關注的是社會、政權結構的影響。因為不同的社會政權結構能夠利用的兵種、戰術形式有很大不同，當某種兵種戰術被“移植”到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中時，其特徵也會發生相應變化，以便適應新的社會

環境與作戰目標。

第二編，“南征與北伐：經典戰例”。

本編首先關注軍事（自然）地理層面：北方民族能夠成功入主中原，卻遲遲無法攻滅偏安江南的漢族政權，首要原因是中國南北方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淮河、漢江以南是高溫多雨的亞熱帶氣候，地理環境上表現為水網叢林地貌，限制了騎兵的作戰效能，加之長江天塹等因素，使得北方政權始終難以跨過長江、統一中國。

反之，缺少騎兵的南方軍隊在北伐時，也難以適應淮河以北的自然環境：第一，缺少畜力運輸的南方軍隊更倚重內河航運，而北方河流稀少，且旱季缺水時更難通航；第二，平坦無遮蔽的北方平原便於北方騎兵馳騁，使南方步兵處於被動地位；第三，北方冬季的嚴寒使南方士兵難以適應，冬季結冰也使河流喪失了航運和作戰屏障的作用。

以上自然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造成了4-6世紀（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南北政權的長期割據對峙，遲遲不能實現統一。至於三國時期的南北對立，除了北方政權的民族特徵外，其他都和4-6世紀基本相同。4-6世紀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續得比三國時期要長，則是因為北方政權內部整合（即所謂“中原化”）的進程耗時較長所致。

本編集中討論3-6世紀（三國至南北朝）四百年內若干場南北政權之間的重大戰役，包括戰前的戰略決策、戰爭過程中的戰役執行情況，以及各種現實因素對戰局進程的影響。代表南方軍隊北伐戰爭的戰例，是東晉桓溫對前燕的北伐，劉裕對南燕、後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權南伐及統一中國的戰例，則是3世紀的西晉滅吳之戰和6世紀的隋滅陳之戰。本編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戰例進行探討：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對戰爭的影響。人類社會的階級、民族區別和政權對立都曾是導致戰爭的原因，這在 3—6 世紀的南北戰爭中表現得極為明顯。政治體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驅動、精神追求更會決定戰爭的發動以及具體作戰形式。例如東晉士族苟且、貪生怕死的作風，導致對北方戰爭長期處於被動局面；而以劉裕為代表的北府兵軍人集團，則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這導致了桓溫北伐與劉裕北伐的不同結局。此外，政權的組織形式、政治模式的區別，也導致戰爭動員程度、戰術運用水平的差異，從而產生不同的戰爭和政治後果。

第二，地理環境因素對戰爭行為的制約作用。本編重點討論長江在南北對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晉、隋統一戰爭如何克服長江天險；在桓溫、劉裕北伐部分，本書也重點討論南方北伐軍隊如何藉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開挖運河的方式進行軍事運輸。通過這些戰例可見，高明的戰略家會利用各種手段克服自然環境的約束，地理對政治、軍事行為只有一定的影響作用，而不是決定因素。

第三，統帥意志、能力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歷史發展的或然、不確定性。戰爭行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指揮原則，所以最高統帥的意志、能力及對局勢的判斷會從根本上影響戰局。戰略決戰的勝負則會直接導致政權的興亡，由此帶來宏觀歷史發展進程的轉折。少數人的決策造成對社會的普遍影響，這是戰爭史與其他經濟、文化、制度等專門史最大的不同。這個特點又帶來歷史發展的或然性、不確定性。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戰爭，成敗往往由於統帥的一念之差而定。比如西晉滅吳之戰，晉武帝司馬炎指定的各戰區統帥意見不一，如果司馬炎、王濬對局勢的判斷稍有遲疑，都會導致伐吳之役中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將繼續下去。前秦試圖攻

滅東晉的戰爭，秦軍本來佔有絕對優勢，但苻堅在淝水一戰的決策失誤，導致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續下去。所以本編在探討重大戰爭戰役的進程時，試圖擺脫各種決定論、先驗論的約束，再現戰事進程具體環節，以及當時可能出現的種種後果。只有梳理清楚這些，才能理解當時戰爭統帥決策的高明或者昏聩之處，並為當前的決策行為提供借鑑。

第三編，“成功轉型與積重難返：南北朝的戰爭與政權”。

本編主要討論南北朝時期戰爭與政權、民族、社會的關係，包括北魏政權的轉型與戰爭模式的變遷；南朝的財政、政治與戰爭的關係。

4—6世紀長期的對峙戰爭，和南北方政權形態有着密切關係，這集中表現在政權維持戰爭的形式上，包括騎兵、步兵、水兵等兵種的組建，兵員與戰爭物資的籌措，以及軍事將領在政權中的地位等等。北方政權的建立者多出自遊牧族（即使並非完全遊牧的氐羌等西北民族，畜牧在其經濟生活中也佔較大比重），早期政權形態也保留着較多草原部落制特徵。但如果北方政權試圖將戰線推進到淮河、漢江流域，必須以步兵為主力，採取穩定而持續的推進戰略。這需要北方民族政權加強對中原漢地的統治，用中原的戰爭方式、資源維持對南戰爭，即北方政權形態實現從遊牧族到“中原化”的轉變。只有北方政權實現對中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之後，才能夠對南方政權形成實質威脅。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剛剛驅逐後燕、入主中原時，還是以騎兵為主的遊牧族作戰方式，不擅長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長管理農業地區，導致戰事曠日持久，對河北城鄉造成了慘烈的破壞。隨後數十年裡，北魏逐漸積累了一些管理農業地區的經驗，步兵數量和攻城技術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燾能攻滅周邊的北燕、夏、北涼

等政權。再幾十年後，北魏更加習慣統治農業地區，又攻佔了山東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政權幾乎全面漢化，兵種數量以步兵為主，所以戰線南推到淮河—漢中一線。

後世的金、元、清等政權，向南擴張的程度，也與其對漢地統治的深度有直接關係。所以成吉思汗雖然西征萬里，席捲大半個亞歐大陸，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說江南；而滅南宋佔領整個中國，要到其孫子忽必烈時期，那時蒙古人對漢地的統治技術已經大大提高了。

南北戰爭對南方政權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在東晉一朝，軍政權力往往被高層士族分割，多次形成長江上下游荆、揚兩大戰區的對立。這種內爭與對北方戰局的進程有密切關係。到南朝皇權振興，士族政治終結，在對北方的戰爭中，又經常以對北方的某一戰區為基礎形成軍人勢力（集團），進而造成南朝的改朝換代或者帝位更替。南朝的皇權與軍人勢力始終在合作與對立之間徘徊，軍人集團沒能找到實現自身鞏固與發展的政治、文化基礎，而南朝社會的軍事動員程度也未能發展到最高水準，最終只能由北方的隋政權實現統一。

戰爭與財政的關係比較密切，但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權的表現又不相同。只有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貨幣化程度比較高的財政體系裡，戰爭行為才會引起政府貨幣開支的急劇增加，使戰爭行為與財政行為的關係非常密切。如果缺少商品經濟和貨幣財政，政府主要通過直接徵發力役、兵役和各種實物維持戰爭，就不容易見到財政和戰爭的互動關係了。中國歷史上，漢代財政的貨幣化程度比較高，所以東漢與羌人的三次戰爭，軍費開支都有明確記載。從三國戰亂開始，社會經濟凋敝，北方的商品經濟水平下降，貨幣在財政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小。但江南地區財政的貨幣化程度一直超

過北方，所以在南朝時期對北魏的歷史次戰事，都帶來了政府超發貨幣等財政後果。在後世，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兩宋與北方政權的戰爭中，南方宋政權的這種貨幣化財政與軍事行動的關係同樣密切，北方政權則不那麼顯著。

所以從這方面總結，江南一直是經濟、財政進步趨勢的代表，但可惜的是，這種進步特徵未能帶來軍事上的優勢，反而造成了政權對軍事行動的承受能力下降，最終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帶來社會經濟的倒退。這是個比較大的題目，在本書中只能討論南朝時期。

研究方法與目標

魏晉南北朝的割據戰亂帶來了無盡的殺戮與流離。這是古人與今人都不願親歷的悲劇時代。但在這動盪過程中，社會、階級在破壞與重組，民族在走向融合，整體歷史也從混亂走向新的秩序。如果超越個體層面的生死別離，這一時期的南北戰爭也是一個觀察中古時代的獨特角度，尤其是社會在戰亂衝突等“極端狀態”下的特殊表現。通過總結 4—6 世紀南北戰爭，本書希望深化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和探討：

第一，還原古代冷兵器戰爭的本來面貌。本書第一編對騎兵、步兵具體戰術的討論，如騎兵衝擊作戰的形式、步兵軍陣的組織與作戰原則等，便是希望通過零星的史料還原冷兵器戰爭原貌，使今人對中國古代戰爭的認識更加理性、真實。所以本書的冷兵器戰術部分具有一些所謂“知識考古學”的味道。毋庸諱言，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以歐洲冷兵器時代的戰史為參照。因為戰爭是基於人

的體能與技術手段的血淋淋搏殺，現實而殘酷，來自所謂不同“文明”的人在戰場上相遇時，都只能表現出作為人的求生克敵本能，不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封閉性和不可對話性等等。從這個層面說，戰爭也是人類諸種文明最基本的溝通途徑，它無視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態等種種差異，使其在競技場上一決生死，蒙古大軍的西征、近代的鴉片戰爭都可以作為例證。由於元以前中國古代的歷史比較獨立，與其他文明的直接衝突極少，用理性的手段對中國古代戰爭進行“祛魅”，實現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溝通顯得更有必要。

第二，探討戰爭、戰役背後的諸多制約因素。《史記》中趙奢批評其子趙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戰爭的結局只有勝、敗兩種，最為簡單，而影響戰爭勝敗的因素卻有無限多。戰爭與棋類遊戲的不同，就是不可能用數學方法進行全面模擬。時間、地點、兵力、兵種、後勤、情報、疫病、將士的素養、士氣、後方政務，乃至投誠、叛變等無窮多的變量，都對戰事產生着實際影響。統帥的職責便是確保將這些變量盡可能地考慮周全，同時找出敵軍統帥尚未注意到的新變量因素，從而將敵軍擊敗。而史學研究最習慣的模式是“找原因”，在史料中搜尋確定極為有限的自變量和因變量，構建因果關係的敘事。如果只限於理論討論的話，任何研究領域的構建均可以自圓其說，但用簡單的因果變量來分析戰爭難免流於“易言之”，成為純粹的紙上談兵。所以，本書第二編在討論北方政權南征、南方政權北伐等戰爭個案時，不僅從時空（自然地理、季節）出發，還盡量從史料中搜尋影響戰爭進程的其他因素，從而剖析偶然性對實際戰事的影響，探討戰爭雙方統帥意圖的差異、這些意圖在實際戰役進程中的實現程度以及各自的應變措施。

第三，從戰爭的角度研究歷史與社會。魏晉南北朝史料比較有限，目前史學界對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財政、文化等諸領域已經進行了深入研究，幾乎已不存在尚未開墾的新領域。但如果從戰爭這個互動的、“活的”角度來觀察，則能在原有的諸研究領域之外發現新的問題，且原來互不干涉的諸領域也因為戰爭發生了聯繫與互動。如本來魏晉南北朝的賦役、兵役制度已經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多是靜態、平面和孤立的。本書第三編討論北魏的軍事動員問題，則側重北魏的社會結構、軍事需求與兵役制度的關係，以及實際戰爭導致的兵役制度的變遷；南朝軍事動員部分則側重討論貨幣財政與對北戰事的互動關係。再如本來學術界已經對馬鐙在戰爭中的作用進行了充分討論，本書第一編分析騎兵戰術轉型與馬鐙的產生，則從中原與遊牧族的權力結構來探討騎兵戰術的區別，中原的軍事需求導致騎兵戰術的轉型和馬鐙的出現，以及遊牧族為適應這種新騎兵戰術而進行的政權模式轉型。這就避免了單線的技术進化論、技術決定論研究模式。不同社會形態、政權結構進行戰爭的模式都有區別，而戰爭手段的變化也會造成政權與社會的轉型。從這個角度可以獲得歷史研究的新視野，其適用範圍不僅限於魏晉南北朝。同樣，民族、階級、文化等要素也一直與戰爭行為發生着互動，進行貫通古今與中西的研究將是大有可為的。

以上是本書的嘗試創新之處。但由此造成的困難也顯而易見：戰爭與人類社會的諸多層面都有複雜互動關係，而本書能夠討論的內容只能是有限的甚至是掛一漏萬的。有些問題尚來不及討論，比如戰線上的南北民間交流，戰爭對民眾生活的影響，戰亂中的人們對於生命、死亡、生育的觀念，以及當時道教、佛教的流行與戰爭的關係等等。這些都需要在以後的工作中彌補。

文獻綜述

關於南北戰爭的研究，按照本書所分的三個層面，史料數量並不均衡，學術界的研究數量也存在差別。由於本書涉及的內容比較龐雜，很多前人研究成果與觀點將在正文各編中進行討論，此處不一一羅列，只就主要史料與研究現狀進行摘要說明。

兵種與戰術層面：中國古代史籍對戰爭，特別是戰役、戰鬥層面的直接描寫較少，只有個別將領的傳記中有零星記載，自宋代至清代的歷史編纂、考據者，對這個問題也少有關注。中國古代的“兵法”多側重戰略問題，較少討論戰術層面，如軍隊的組織結構、軍陣的隊列原則、接敵作戰的要領等等。這使得目前對古代戰爭史戰術層面的研究成果並不太多，只是近幾十年來出現的一些考古成果，才引發了關於兵種戰術的討論，主要是對出土的騎兵俑、馬鐙、馬具裝等騎兵造型和實物的分析討論。如楊泓先生從相關考古材料出發，結合文獻記載，對當時騎兵的裝備、戰術進行了充分研究，特別是對馬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在軍事上的意義做了詳盡闡述。^① 其他研究者也從考古材料出發進行了探討。^② 但總的

① 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文物》1977年第10期；《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9期；《騎兵和甲騎具裝二論》，《華學》（第三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② 柳涵：《北朝的鎧馬騎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頁；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年第6期；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第85頁；李慶發：《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考古》1977年第2期；張雪岩：《集安縣兩座高句麗積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來說，由於文獻和考古材料的局限，戰術問題的研究成果並不多。

除了正史、別史、類書中的零星記載，還有三本古代“兵書”值得注意：成書於戰國後期的《六韜》，唐代的《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和明代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因為中國古代多數兵書都側重探討戰略思想，而這三本兵書比較側重討論技術、戰術層面的問題。後兩本兵書雖是隋代以後的產物，但在探討中國古代兵種戰術變遷方面仍有重要意義。當然，三書也有不同：《六韜》採用的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周武王問答的形式，但實際成書應在戰國後期。它的內容比較龐雜，以討論軍隊建制和戰略戰術為主，針對的是戰國後期中原列國間的戰爭，描述的是作者心目中一支理想軍隊的構成、作戰方式，但通過這些理想化的素材，仍可恢復戰國末期戰爭的部分細節；^①《紀效新書》與之相反，主要是戚繼光對自己練兵、作戰的經驗總結，切中實際，另外，戚繼光雖是明代人，與本書討論的中古時代有一定距離，但戚繼光時代的戰爭仍是以冷兵器為主，從中亦可歸納冷兵器戰爭的諸多特點；《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全書已經散佚，只能根據《通典》恢復部分內容，主要是步兵作戰紀律與要領，也彌足珍貴。^②

戰略與戰例層面：傳世文獻主要是歷代正史，對當時戰爭的時間、地點、進程等多有記載。但對於每一場單獨的戰役則少有詳盡

① 《六韜》託名姜太公所作，長期以來被疑為偽書，但1970年代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河北省定縣八角廊的西漢墓中都出土有《六韜》簡，證明此書在西漢早期已經流行。參見本書第一章。

② 此書已經亡佚，但在《通典·兵志》中有一些引用。現存所謂《唐太宗與李靖問對》（簡稱《唐李問對》或《李靖問對》），《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未著錄。宋人何遠、陳師道、鄒博、吳魯等人認為是宋人阮逸偽作。而《通典》所存《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則保留了唐人著述原貌，比較有價值，參見本書討論步兵戰術的章節。

記載，比如雙方投入的兵力、兵種構成，統帥的作戰意圖，戰場的地理形勢和雙方軍隊的展開方式，戰役的詳細過程等等，記載都很缺乏。而且由於傳統正史的紀傳體模式，關於一場戰爭的記敘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傳、紀甚至志中，加之在分裂時代，南北王朝各有正史，對同一場戰爭往往有不同記載。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時將這些散見於不同篇章的史料進行了匯總、排序，這對於戰爭史研究有重要意義。不過《資治通鑑》並未全從戰爭史的角度分析、梳理這些史料，所以難免有疏誤之處，加之對材料取捨的標準不同，也遺漏了一些正史中很重要的戰爭記載。^①但在司馬光時代尚有《十六國春秋》等現已亡佚的史書，所以《資治通鑑》中有些關於戰事的記載不見於現存諸史，是其可貴之處。在正史之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也保存了一些與當時戰爭有關的珍貴史料。

在軍事地理方面，北魏後期酈道元的《水經注》不僅記有大量的地理信息，也保存了當時人關於南北間戰爭的記載，對於戰爭史研究很有價值。在胡三省為《資治通鑑》所作的注中，有較多對地理方位的考辨，這對於研究當時的戰爭地理很有意義。此外，杜佑《通典·州郡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歷代地理志書和考史著作對軍事地理研究亦多有借鑑意義。出土文獻中關於戰爭的史料比較缺乏，如文字信息較多的魏晉南北朝墓志，往往只記敘志主的家世、官爵，但極少有對當時戰爭的記載。所以出土文獻在這方面提供的幫助較少。

① 比如 410 年，劉裕攻滅南燕政權之後，回師建康對付天師道武裝，他從南燕戰場帶回了一支俘獲的鮮卑“虎班具裝”騎兵部隊。但不知出於有意或無意，《資治通鑑》未載此事。參見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

在軍事地理研究方面當代學者已有較多研究成果。^①對中國古代戰爭史的綜合性研究著作，首推台灣“三軍大學”1972年編著完成的《中國歷代戰爭史》。^②此書編纂時間長，篇幅較大，對每一場戰爭、戰役都有詳細討論，有較強的參考價值。但對於4-6世紀戰爭的研究，該書還有不足之處：第一，缺乏對當時兵種、軍事地理、後勤等專題問題的系統研究；第二，史實考辨仍未脫離《資治通鑑》的水平，對很多具體問題尚缺乏分析。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些古代戰爭史研究著作，^③其中以《中國軍事史·兩晉南北朝軍事史》較為詳盡。與《中國歷代戰爭史》相比，該書在軍事制度、兵種發展等專題內容上借鑑了近年來史學界的研究成果，更有參考價值。但該書相比《中國歷代戰爭史》，對具體戰役的再現和分析不夠詳盡。

戰爭與政權層面：政權結構研究屬於傳統政治史範疇，在傳世史料中數量最多，當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如關於北方民族的政

-
- ① 如史念海：《論我國歷史上東西對立的局面和南北對立的局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輯；胡阿祥：《東晉南朝的守國形勢——兼說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對立》，《江海學刊》1998年第4期；何榮昌：《略論六朝的江防》，《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郭黎安：《六朝建都與軍事重鎮的分佈》，《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外，還有歷史地理方面的一些論著，也與當時的戰爭態勢有直接關係。比如王鑫義：《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淮河流域漕運》，《安徽史學》1999年第1期；楊鈞：《巢肥運河》，《地理學報》1958年第1期；劉彩玉：《論肥水源與“江淮運河”》，《歷史研究》1960年第3期；馬騏、高韻柏、周克來：《將軍嶺古“江淮運河”的考察及發現》，《長江水利史論文集》，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郭天翔：《含山縣的“三關”“六口”》，《含山文史資料》（第三輯），政協含山縣委員會出版，2007年；嵇果煌：《中國三千年運河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
- ② 台灣“三軍大學”編：《中國歷代戰爭史》，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3年。兩晉南北朝部分在第五、六冊。
- ③ 比如張文強：《中國魏晉南北朝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朱大渭、張文強：《中國軍事通史·兩晉南北朝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治形態的中原化問題（以往學者多用“漢化”或“封建化”概念），陳寅恪對十六國、北魏政權的漢化，關隴集團的產生都做過系統而精彩的論述。^①唐長孺、周一良、田餘慶等學者亦對此問題有深入論述，^②東晉南朝政治形態以及不同階級、地域的人群與當時政治的關係，史學界也已經有較多研究成果。^③還有西方學者借鑑人類學田野工作成果，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研究草原民族與中原的互動關係，^④也是本書的重要討論對象。所以在第三編中，對於前人已經有較多研究成果，且基本有定論的問題，比如東晉的門閥政治和荊揚之爭，西魏—北周“關隴貴族集團”出將入相的特色等等，本書就不再涉及。

-
- ①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年。
- ②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周一良：《乞活考》《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田餘慶：《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 ③ 如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另外還有諸多研究成果，如章義和：《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鄭敬高：《南朝的將門》，《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與南朝寒人之得勢》，《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陳琳國：《論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人大複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91年第9期；羅新：《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張琳：《南朝時期的雍州中下層豪族》，《武漢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魯力：《孝武帝誅竟陵王事與劉宋宗王鎮邊問題》，《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安田二郎：《晉宋革命與雍州僑民》，《東洋史研究》第42卷1號。
- ④ 如[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巴爾福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袁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賀嚴、高書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第一編

騎射、衝擊與軍
陣：步、騎兵戰
術的演變

本編分為六章，分別討論中國古代騎兵、步兵的戰術特點，以及這兩個兵種在先秦到隋唐之際的發展。在 4 世紀初，北方民族憑藉騎兵優勢入主中原，分裂時期北方政權的騎兵優勢也較為明顯，所以騎兵和步兵兩個兵種的實力對比、戰術特點對南北戰爭造成了重要影響。

騎兵方面，第一至五章梳理了騎兵從戰國到南北朝時期的戰術發展過程：先秦到漢初，遊牧族和中原的騎兵戰術特點都是騎射和遊擊，不能充當主戰角色，也無法擊敗步兵主力；到漢武帝時，中原騎兵為了對抗匈奴的騎射技術優勢，開始採取衝擊肉搏的戰術，由此帶來騎兵裝備的變化。為了保障騎兵衝擊時的穩定性，馬鞍逐漸加高，最終在 3、4 世紀之交導致馬鐙出現，使騎兵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衝擊威力。這一輪騎兵戰術革新發生在中原，但很快被北方民族學會，使他們獲得了壓倒中原的軍事優勢，這造成了西晉的崩潰和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以及之後延續近三百年的南北割據戰爭。

步兵方面，第六章討論了冷兵器時代步兵最基本的戰術特徵：隊列密集、移動緩慢的軍陣作戰。戰國到漢初，騎兵尚未勝任衝擊職能，陸戰的主要形式是步兵主力軍陣互相作戰，這一時期步兵軍陣的特點是近似“方陣”，正面窄而縱深大。在騎兵衝擊戰術逐漸普及完善之後，步兵軍陣為了提高應對騎兵衝擊的能力，以及便於從側翼包圍敵方步陣，開始加寬正面、縮小縱深，即方陣變得“扁平化”。此外，4—6 世紀南方政權的步兵為了適應南方自然地理環境、對抗北方騎兵，也出現了一些獨特的戰術。

第一章 早期騎兵戰術特徵：騎射與遊擊

第一節 匈奴騎兵戰術與其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的關係

最早的騎兵來源於遊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權組建騎兵的濫觴，則是戰國中後期趙武靈王學習遊牧族的“胡服騎射”。顧名思義，這種早期騎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騎射”是草原遊牧族傳統的狩獵技術和習慣戰術，甚至是遊牧族身份認同感的重要來源。冒頓單于在給漢文帝的信中，談及他統一北方草原的功業，就驕傲地宣稱：“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①這不僅是戰術問題，而且是與遊牧族的生活形態密切相關。《史記·匈奴列傳》保存了戰國至西漢中葉包括匈奴在內的北方遊牧族的珍貴史料，其中對遊牧族戰術素養的描述是：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
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②

① 《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6頁。

② 《史記·匈奴列傳》，第2879頁。另外參見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4-77頁；“狩獵業成為練兵習戰的手段”節。

射獵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族人經濟生活的一部分，這直接影響了游牧者的戰術形式。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匈奴等草原民族採用單兵騎射戰術，幾乎從不與敵軍進行近距離的衝擊肉搏作戰：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①

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②

游牧族的傳統習慣戰術是“騎射”而非衝擊肉搏，這不僅有生活習俗、戰術層面的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族缺乏中央集權有直接關係。因為在飛馳的、無馬鐙的馬上進行衝鋒肉搏的近戰，騎士的傷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對抗中原密集的步兵軍陣時。只有嚴厲的軍事紀律才能強制士兵們投入肉搏作戰，但草原上恰恰缺乏這種政治傳統。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已經發現，北方草原的權力趨於分散，領袖對部屬的權威和控制力遠不如漢地，當游牧族部屬對領袖失去信賴，很容易帶着畜群遠走他鄉。拉鐵摩爾認為，這是游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動性”所致。^③巴菲爾德在這方面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對游牧帝國權力結構的總結是：

內陸亞洲游牧國家以“帝國聯盟”的方式組織起來，它們

① 《史記·匈奴列傳》，第 2879 頁。

② 《史記·匈奴列傳》，第 2892 頁。

③ [美] 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4-57 頁。

在對外事務上是像國家那樣獨裁的，但內部組織則是協商與聯盟化的……

在地方層面上，部落結構依舊維持自身形式，在權力來自於自身民眾支持而非帝國任命的部落酋長的統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層面國家結構變化甚小，無法最終確保將草原上擄掠成性的當地人聯合起來。……帝國政府壟斷了對外及戰爭事務，使帝國在相關問題上作為一個整體而與其他力量討價還價。^①

巴菲爾德是從遊牧社會與中原漢地的政治關係層面來論述的，並未聚焦到騎射戰術這麼微觀的層面，但他的結論對於討論遊牧族戰術仍有重要意義。狄宇宙專門考察匈奴帝國的權力體系，也得出了和巴菲爾德類似的結論：

很顯然，在中國的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種觀點，認為單于的權力與中國的皇帝相比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通過對漢王朝與匈奴外交關係的考察表明，從公元前 198 年到公元前 133 年期間，中國北部邊疆地區不斷遭受侵襲，因為在匈奴人的部落聯盟中缺少一個絕對的權威，以確保貫徹落實和平條約的內容。^②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馬遷對匈奴騎射戰術的描寫，他認為，司馬遷這種記載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臘、羅馬人對草

① [美] 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袁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0-11 頁。

② [美] 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賀嚴、高書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265-266 頁。

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轍。^① 本書則認為，這種騎射遊擊戰術與遊牧族鬆散的權力結構有直接聯繫：匈奴人騎射作戰“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參戰動機是為了劫掠財物致富，來自單于的賞賜不過是象徵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領對下屬戰士沒有絕對權威，無法強制他們從事過於危險的行動，所以匈奴人從不與敵軍進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戰，也不會採用危險的肉搏衝擊戰術。從戰國到漢代前期，遊牧族從未與中原主力軍隊進行過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過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②

反觀中原，自春秋末年以來，步兵開始成為戰場主力兵種，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孫武為吳王闔閭訓練宮女“吳宮教戰”“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證。戰國初期，中原列國通過變法運動，都確立了這種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兩相對照可以發現，匈奴等遊牧族騎射、遊擊的戰術形式，與其生活方式和社會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

① [美] 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第324-325頁。

② 可參考林幹對西漢前期匈奴歷次入塞劫掠的總結，見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3頁。